

社会联系与中国政治精英的选择

早期研究发现共享背景往往会产生官员晋升收益，但是相关的结果是否完全具有说服性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由来自波士顿大学的 Raymond Fisman, 麦考尔大学的 Jing Shi, 港中文大学的 Yongxiang Wang 和外经贸大学的 Weixing Wu 四位学者合作并发表在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上的论文“Social Ties and the Selec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Elite” 使用战前数据发现与在任的政治局成员是老乡或校友的中央委员在下一届选举中的晋升概率可能会下降 5%-9%。与以往文献的研究范式不同，这篇文章主要使用 *fixed effects* 吸收了跨城市和大学的组间差异，区别于晋升收益发现了这种“关系惩罚”。

I. 背景

首先，文章介绍了中国政体组织和选拔机制背景。

第一，文章说明“中央委员会是由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组成的政治机构。中央委员的人数每届都有浮动，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每届中央委员约有 200 人。”中央委员成员包含国家领导人、首席官员（组织部、宣传部）、部门负责人、省长、党委书记、首席军官，以及八个“人民组织”的领导人。以十八大为例，中央委员会共有 205 名成员，其中 171 位是候补委员。候补委员没有投票权，但是有很大概率被晋升为正式成员，他们通常是省级或市级的高级官员，可能接替在任期内去世或被免职的中央委员成为正式成员。

第二，政治局成员的选拔，在初次会议中，从中央委员会中选拔出 25 名中央领导，在后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还选出了少量的额外成员，以取代因死亡、腐败而被免职、或因政治原因被清洗的政治局委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作者们将各任期内选出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列为新成员，并对他们的关系进行编码。

第三，政治局选举遵循“单一候选人选举规则”。从名义上讲，中央委员会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政治局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实际上，这两个机构的组成在投票之前就已经确定了。文章认为“这个过程是由政治局（特别是政治局常委会）推动的。”同样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从候补委员到正式委员的选举，在早期也遵循单一候选人规则。1987 年，候选人名单相对于职位数量有所扩大，倡导“党内民主”，也就是说，政治局（常委）成立并派出调查小组前往全国各地寻找有前途的候选人，筛选出一个“初选名单”，然后再进行最终选择。

综上所述，文章强调政治局正式候选人名单的选择是秘密进行的，这个过程有在任的政治局所控制，政治局同样控制着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产生。

II. 数据

文章使用的主要数据是全部中央委员会成员（包括政治局委员的一小部分）的背景资料。数据集来自在线的人民日报中央委员会成员名单。数据最早可追溯到第七届（1945-1956）。具体的信息包含成员的出生地，出生年份，以及详细的教育和工作经历。对于第九届和第十届选举（1969-1973 年和 1973-1977 年）中的一些候选人在数据库中没有收录，代替使用的是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的较低级别的官员。

对于变量的测量：(1) 主要因变量： $Elected_{it} = 1$ 表示候选人 i 在 t 期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的指标变量。(2) 衡量中央委员会成员和现任政治局委员之间的共同

背景: CityTie=1 表示 t 期的候选人 i 在 t-1 期至少与一位政治局委员存在着同乡关系, CollegeTie 表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委员的本科院校相同, Shared work background 表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委员曾经在同一个县的同一个组织或者部门工作。(3) 控制变量: Military (中央委员会成员是否为军官), 4 Leaders (是否为北京、上海和天津其中一个直辖市的党委书记, 或者是广东省的党委书记), Province (是否是省级官员或者党委书记), Princeling (候选人的父母或岳父岳母是否曾担任过党委书记), hometown, workplace, and college fixed effects (捕捉到这些背景特征的平均差异)。

样本中共有 1273 名候选人, 其中 654 名只出现过一次, 409 名出现过 2 次, 210 名出现过三次及以上作为候选人。PriorCandidacies 表示个人作为中央委员会(非政治局)成员出现的次数。中央委员会成员任期越长, 成功晋升的可能性就越大。根据数据的描述, 发现(1) 在官僚机构中升迁时, 存在对教育的正向选择。(2) 在官僚机构中处于快速通道的个人将被分配到更有声望的职位上, 以期待他快速晋升。(3) 一些地县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政治局成员。

III. 结果

本文主要使用的估计模型如下:

$$\text{Elected}_{it} = \beta + \text{Connection}_{it}^c + \gamma_c + \omega_t + \epsilon_{it}$$

其中, Connection_{it}^c 表示候选人 i 与至少一名在位政治局委员关系, 关系类型包含 CityTie, CollegeTie, WorkTie 三类。共有 219 个家乡的固定效应, 264 个学校的固定效应和 305 个工作场所的固定效应。 ω_t 表示选举届的固定效应, ϵ_{it} 在候选人层面聚类。

基准实证结果发现, (1) 有家乡联系的候选人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的可能性降低 6.20%。(2) 有学校联系的候选人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的可能性降低 10.90%。

(3) 工作联系没有发现相应的“关系惩罚”, 因为晋升可能是受欢迎或者特殊的职业轨迹的结果。其次, 构建 CityorCollegeTie 的交互变量, 加入候选人层面的控制变量, 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但是, 一个可能的内生问题是纳入群体固定效应可能会在联系和选择之间产生机械的负相关。这是因为 t 期没有关系的群组可能会因为在 t+1 的晋升而产生关联, 这种偏差可能会因固定效应而加剧。解决的方法是使用子样本来估计, 仅保留第一次作为候选者出现的样本。结果发现, 家乡和大学关系的关系惩罚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

IV. 关系惩罚的异质性

文章提出三种关系惩罚异质性的解释: (1) 反派别论。由于毛泽东的反派主义著作强调, 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 关系惩罚的强度发生变化。检验结果发现这种强度在毛泽东时期最为明显。(2) 组内竞争。有共同背景的政治局委员可能会争夺地位和资源, 这种竞争一般在一个围绕在资历更老的政治局委员周围的集团内的个人之间更加激烈, 因此这样的组内对晋升的关注度更低。因此, 相对于 PSC (政治局常委) 关系, 非 PSC (政治局委员) 组内的关系惩罚更强。检验结果发现, 存在组内竞争的解释。(3) 配额和组间竞争。具体含义是限制政府内部任何个别派别获得权力过大。其一, 推测已经当选过的团体应该有更高的关系惩罚。可以根据群组中是否有一个以上的政治局成员, 或者是最大的团体来查看; 其二,

可以比较与留在新政治局的政治局委员和退休政治局委员之间的关系惩罚，因为退休政治局委员一般不会影响配额或集团间的权力竞争。最终的检验结果拒绝了配额和组间竞争的解释。

V. 与早期研究对共享背景和迁移的比较

由于所得结果与先前的研究结果形成鲜明对比，作者们更详细地探讨了可能导致我们发现共享背景的成本而非好处的差异。因此，将本文与三项最近的重要研究（Shih, Adolph, and Liu, 2012; Jia, Kudamatsu, and Seim, 2015; Francois, Trebbi, and Xiao, 2016）进行对比。这些更早的文章都发现了与政治局级官员的联系的好处，基于共同的工作经验和（或）共同的家乡或大学联系。在总结了每篇论文中采用的样本、估计策略和变量定义，并与我们的论文进行比较之后，作者们使用与早期论文相类似的估计范式，也可以在本文的数据中估计出共享背景的好处。然而，主要区别在于本文使用了群体的 *fixed effects*，和对共享家乡和大学背景的强调。

VI. 结论与讨论

文章发现：（1）在中国政治局候选人中，那些与现任政治局委员有老乡或大学关系的人当选的可能性较小。（2）文章研究了关系惩罚的异质性，并发现与较低级别的政治局委员有关系的人，其关系惩罚要强得多，这表明具有共同背景的官员之间的竞争；此外，观察到与即将退休的和未退休的政治局委员有类似的关系惩罚，这说明基于配额和组间竞争的解释是不成立的。（3）与早期论文相比，本文使用 *fixed effects* 排除组间差异关注组内差异，可以帮助解释主要结果。

关于文章的讨论：不考虑本文的政治意识形态，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排除组间差异评估组内差异的实证方法值得学习。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在 *fixed effects* 使用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非随机性的内生性（*selection into identification (SI)*）的检验仍然需要进一步解释，文章中只给出排除样本的一种检验，需要继续检验是否又其他机制导致存在组内的异质性。